

毛泽东哲学与 中国文化精神



何显明 著
雍 涛

广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何显明 雍 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董苏煌
责任校对 高 健
(桂)新登字 01 号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何显明 雍 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1168 1/32 开

15.875 印张 395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委附属印刷厂印刷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20册

ISBN7-219-02360-X/A-10

定价:9.5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诞生的文化背景	(5)
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民族文化的新生	(6)
1.1 近代中国文化的危机	(6)
1.2 拯救与困境: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及其历史局限	(9)
1.3 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哲学的精神摇篮	(15)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26)
2.1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民族文化心态	(26)
2.2 两极相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	(35)
2.3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格	(45)
三、毛泽东哲学的诞生及其思想历程	(53)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的文化性格	(63)
一、毛泽东哲学的中国哲学气质	(63)
二、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文化根基	(72)
三、毛泽东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升华	(91)
四、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意义	(102)
第三章 实践理性与实事求是之学	(112)
一、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的灵魂	(112)
二、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的认知模式	(119)

三、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理论取向·····	(129)
四、实事求是: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思想风格·····	(139)
五、实事求是:襟怀坦白的道德人格·····	(148)
第四章 现代知行合一论 ·····	(155)
一、毛泽东早年的知行观 ·····	(156)
1.1 悠久的历史传统 ·····	(156)
1.2 朱熹·杨昌济·青年毛泽东 ·····	(160)
1.3 早年毛泽东知行观的基本内容 ·····	(164)
二、传统知行观的科学总结 ·····	(170)
2.1 超越的历程 ·····	(170)
2.2 突破传统知行哲学的藩篱 ·····	(174)
2.3 现代知行合一论 ·····	(178)
三、晚年毛泽东知行观的历史衍变 ·····	(183)
3.1 实践范畴的伦理化趋向 ·····	(184)
3.2 消知以归行 ·····	(189)
第五章 “内圣外王”与主观世界的重构 ·····	(198)
一、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思想模式 ·····	(199)
1.1 “内圣外王”:儒家最基本的精神信仰·····	(199)
1.2 “内圣外王”与五四文化启蒙精神 ·····	(202)
1.3 新儒学:道德主体的重构 ·····	(207)
二、青年毛泽东“内圣外王”式的思想模式 ·····	(211)
2.1 高度注重主体自我的“内圣”实践功夫 ·····	(212)
2.2 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 ·····	(217)
2.3 “内圣”: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途径·····	(220)
2.4 “倡学”:“内圣”与“外王”的现实途径·····	(222)
三、主观世界的全面重构 ·····	(227)
3.1 主体认知结构的改造 ·····	(227)
3.2 主体观念情感的改造与重构 ·····	(232)

3.3 主体道德意志结构的重整	(237)
四、超越中的回归	(241)
4.1 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241)
4.2 悲剧的文化精神之源	(249)
第六章 中西合璧的矛盾辩证法	(255)
一、尚变的诗化哲学气质	(256)
1.1 “《易》学”的思维传统	(256)
1.2 毛泽东的变化发展观	(262)
1.3 浪漫的诗化哲学气质	(270)
二、矛盾辩证法	(278)
2.1 中西辩证法的分野	(278)
2.2 差别、抵抗、矛盾	(284)
2.3 矛盾辩证法与阴阳哲学传统	(291)
第七章 中国式的历史感	(301)
一、历史主义的思想国度	(302)
1.1 悠久的好古之风	(302)
1.2 博大精深的史学造诣	(306)
二、历史的智慧与眼光	(313)
2.1 古为今用：毛泽东的历史主体意识	(313)
2.2 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	(322)
三、毛泽东的历史哲学	(329)
3.1 从心力史观到阶级斗争史观	(329)
3.2 从圣贤史观到奴隶史观	(343)
第八章 现代民本主义政治哲学	(356)
一、民本主义的历史传统	(358)
1.1 仁政王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358)
1.2 从民本哲学到平民意识	(367)
二、民本意识与反官僚意志	(375)

2.1 人民就是上帝	(375)
2.2 官僚主义:人民主权的天敌	(381)
2.3 坚毅执着的违反意志	(390)
2.4 历史的悲喜剧	(397)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本价值的守护神	(403)
3.1 合理化规范与冲天干劲	(405)
3.2 人民主权与权威转型的挫折	(414)
第九章 毛泽东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构	(418)
一、民族文化格局的重构	(420)
二、民族文化自尊心的重振	(429)
三、重建中国道德价值信仰体系	(436)
四、民族思维方式的历史性更嬗	(448)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前景	(460)
一、当代中国面临的文化抉择	(460)
1.1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反省思潮	(460)
1.2 文化激进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	(467)
1.3 儒学“复兴”与当代中国文化	(474)
二、毛泽东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石	(483)
2.1 毛泽东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的方法论启示	(483)
2.2 结语:走向现代化的民族新文化	(490)
后 记	(499)

前言

从文化的视野,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广阔背景中去透视毛泽东哲学的思想特质、文化渊藪,以及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哲学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趋向。这种研究趋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视角转换。视角的转换与方法的更新,给以往呆板的研究注入了清新的活力,使近几年的毛泽东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这对于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哲学的特点和科学价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展望未来中国文化的前景,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严格地讲,从文化视野中开展对毛泽东哲学的学术研究,我们还刚刚起步,甚至相比于国外一些严肃的学者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从宏观上讲,在有关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上,我们的比较性研究,大多是一些实例的类比,对于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一些论著一提起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承继,往往局限于例证毛泽东怎样广泛地运用传统成语典故,引用古代经典,以及如何运用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表述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奥理论;局限于说明毛泽东改造了哪些传统哲学范

畴,等等。其实,这种文化继承仅仅是表层的。要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泽东哲学的中国特性,认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具体地分析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哲学气质、哲学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性格,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态,包括价值观念、认知结构、情感方式等等如何具体地积淀在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如何从他的哲学思想中透露出来。只有把毛泽东哲学纳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流中,把毛泽东的思想意识融入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才能深刻地分析、把握毛泽东哲学的传统文化根基,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学术,自宋以来一直有宋学汉学之分。汉学重训诂考据,宋学重义理阐释。如果套用中国学术概念的话,我们认为,目前对毛泽东哲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多取汉学的研究方法,而缺乏宋学的思想进路,缺乏对毛泽东哲学与传统文化内在精神,即文化“义理”,或者说“形而上”的思想文化联系的研究把握。

从微观上讲,目前对毛泽东哲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存在着过于抽象的偏颇,往往满足于笼统的概括,缺乏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或者在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作用上各执一端,未能对毛泽东一生的文化心路历程作出深入、具体的分析;或者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未能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给毛泽东哲学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此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许多论者都局限于从传统经典著作上去探溯毛泽东哲学的思想渊源,而严重地忽略了正统典籍之外的民族文化心态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作用。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认为李锐提出的问题,具有十分现实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型’与‘隐型’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于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情感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他还指出:“中国进入近代以来,

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因此,“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①他的这个意见是很有道理的。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试图在探讨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联系上作一初步尝试。我们遵循这样两条基本思路。其一是,立足于毛泽东一生的文化心路历程,从多方面具体分析、探索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儒、道、释、法、墨等诸家,显型文化与隐型文化,对毛泽东及其哲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进而透视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以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在文化精神上的承继与变革。我们反对笼统武断地将毛泽东视为传统主义者、田园乌托邦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或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者,拟通过实证的研究,分析批判海内外某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化的偏颇。其二是,将毛泽东哲学置于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融合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探索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地位。一方面,通过对毛泽东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文化思潮的比较研究,以及毛泽东哲学对现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的承担和实践,去分析界定毛泽东哲学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即它对完成拯救民族危亡和民族文化危机的伟大变革实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一生的不同时期的冲突、融合状况的具体分析,去评估毛泽东哲学对于实现马克

① 李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人民日报》1988年3月28日。

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以及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巨人和思想巨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伟人(包括孔孟程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孙中山),能够象毛泽东这样,在短暂的时间内以自己的哲学与实践,给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带来如此深刻、巨大、复杂的变革。毛泽东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功绩是旁人无法比拟的。本书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哲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毛泽东早年及晚年的一些思想特点,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他的某些消极影响,也作了学术性的分析。在这里,我们认为,仍然用得着李锐说过的一段中肯的话:“象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再说,君子之过,也是人皆见之的日月之食,无从遮掩的,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伟大的历史人物,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曲折的经历,怎样达到其顶峰,或又怎样进入误区甚至降到低谷,这并不会减损丝毫世人对他的尊敬。人总是复杂的,象毛泽东这样扭转乾坤、摧毁旧时代创建新时代的人物,更是异常复杂的。把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复杂‘棘手’的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学术工作的严肃态度。”^①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讲的毛泽东哲学系指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想而言,它与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有别。这一点敬希读者们注意,书中不再一一注明。

① 李锐:《字斟句酌卅年心》,《读书》1991年第2期。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诞生的文化背景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19年11月19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其时正值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大崩溃前夜。两年后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1912年10月辛亥首义,兴奋不已的毛泽东投笔从戎,加入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列。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当时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如饥似渴地精研国学,同时广泛地阅读反映社会思潮走向的新潮刊物,并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1919年5月,当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水岭的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已经成为长沙城里最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自此以后,毛泽东的名字就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直到1976年他离开人世。毛泽东生活、战斗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他是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

毛泽东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近代民主主义者,并最终成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历程,乃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实现由传统向近代和现代递嬗演变的人格化的缩影。毛泽东哲学是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突、融汇的最终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融合而逐步凝聚、积淀而成的理论产物。它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发展最终的体现。

与西方许多学院哲学的精神旨趣大相径庭的是,毛泽东哲学,包括它的精神主题、思想特质、文化使命等等,都是与近现代中国

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近现代中西方交融这一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它本身也是在这种文化交融的一种选择方式,并且它一经产生,便又给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民族文化的新生

1.1 近代中国文化的危机

近代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激荡、动乱最为剧烈的一个时代。这里,既有传统的“气数殆尽”,封建王朝“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不可救药的崩溃,而且还有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发生的根本性嬗变,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开始走向全面瓦解并带来社会的阵痛。更为严重的是,伴随封建制度和社会结构内部的震荡,交织着的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华民族面临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因王朝纲纪湮灭不彰,以及严重的社会利益冲突而导致的风起云涌的“民变”,最深刻的是统治主宰中国人精神世界,长达二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的失落,以及现实社会价值观念出现的危机。近代,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第一次面临真正严酷的挑战。这种挑战的严酷性不仅在观念意识和价值信仰上动摇和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以及投射在国民心理上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华夏本位主义意识,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本身的存亡。中华民族遭受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上的阵痛乃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者,莫不冲冠发上指”(冯桂芬)。

自列强的炮舰轰开中国关闭了几千年的国门后,一直以“加惠四海”、“仁声义问,薄极照临”的眼光和心态俯视四夷万邦,沉醉于

“一统无外，四夷宾服”的世界秩序的迷梦的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生存现实中。近现代的中国再也无法象大清乾隆皇帝那样显示出文明大国的雍容大度，可以大言不惭地回答洋人的通商要求乃是：“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①而且还荒唐可笑地给“倾慕向化”的英王发敕文以示嘉许；如今是不得不向洋人割地赔款以此换取封建统治的可怜的一点生存权。甚至连昔日纳贡称臣的撮尔岛国日本，亦可以迫使堂堂泱泱大国屈辱地割地求和。割地、租借、赔款、治外法权、划分势力范围等等，一切活生生的现实，都促使中国人为民族的危亡和国家的命运寻找解决的出路和办法。

文化与民族精神深重的危机同样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在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记忆中的印象，只有大汉盛唐那种积极主动地汲取、同化外来文化的气度，只有儒家文化全面融汇、消化佛教文化那样的辉煌业绩。然而，这一切早都已成为历史。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汇及其渗透的深入每一步，都是在西方列强野蛮的枪炮声中，在中华民族屡遭失败和整个民族难以言状的屈辱愤懑中进行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再也不是往日那种建立在强大国力和相对发达的文明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主动吸收，而是整个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和发展内在根据的根本动摇，是民族文化的“奇理斯玛”^②信仰的彻底湮灭。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〇〇

② 所谓奇理斯玛(Charisma)，原是基督教用语，用来形容具有超凡魅力的宗教领袖。韦伯在运用它来说明一种权威类型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用它来指具有创新精神人物的非凡品质。追随这种人物或服从这种权威类型的人都相信这一类人物具有天赋的能力和权力，他们能同宇宙间最有权威的人或物保持着神秘的精神联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 Shils)进一步发挥了奇理斯玛的含义，将它同社会的价值秩序联系在一起。他强调奇理斯玛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终极神圣价值，是人们“信仰和价值的中心”。换句话说，每个社会都以人们对某些神圣的终极价值的信仰为基础，形成了一种道德价值秩序。本书沿用这一概念，借以说明中国人传统的核心的价值信仰体系。

在中国,奇理斯玛的精神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家哲学的一些根本信念之中。以这种奇理斯玛终极价值信仰为核心,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的观念,并维系形成了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和道德价值秩序。生活在近代以往的中国社会的人们,无论遇到什么严重的问题,都可以从传统的奇理斯玛价值信仰的范围内得到解答。然而在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随着儒家文化及其在人们心目中影响摇摇欲坠,并逐步走向崩溃,特别是随着传统奇理斯玛信仰的政治象征——皇权制度的崩塌,中国人传统奇理斯玛的价值信仰最终湮没了。这种中心价值信仰的瓦解,其致命的后果,一是对自身的价值信仰与精神追求有着明确意识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异常严重的精神焦虑。他们失却了以往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赤裸裸地被抛向一个陌生的生存世界,开始对传统儒家文化产生日益深邃的疏离感和绝望感。这种精神处境最终促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各种形式抛开儒家文化,去寻求新的价值与秩序。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社会变革尝试,最根本的文化意义都在于此。二是整个社会陷于严重的价值失范境地。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早已千疮百孔,失却了往日神圣的光彩,失去了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而新的道德价值秩序又远未建立起来。这就出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过程中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现象。近现代中国,与军阀混战的混乱政治格局相对应的,便是社会道德精神的日益混乱与堕落,便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道德现实。

民族生存的危机与文化精神的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最严峻的现实危机。近现代中国一切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与奋斗,所致力解决的都是要摆脱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这种双重危机,救亡与启蒙构成了他们拯救中国的两个基本主题。近现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切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包括毛泽东哲学,乃至现代新儒学这种学院味颇浓的文化思潮,都只有在近现代中国

这种现实生存与精神信仰的双重危机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从他们对救亡与启蒙的双重神圣使命的充满悲剧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承担中,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根本的精神旨意。

正是在这民族与文化的存亡之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开始对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现实命运作出新的思考。正是在民族生存竞争惨败的屈辱和辛酸的痛楚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开始踏上拯救民族危亡,摆脱文化精神危机这一痛苦和艰辛的道路。从龚自珍悲愤苍凉的呐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洋务运动,严复对天演哲学的鼓噪,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再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强,艰涩苦闷的文化发展的轨迹。这里,民族出路的寻觅与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救亡与启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近现代的中国,不存在离开救亡的单纯的启蒙。启蒙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救亡,摆脱民族生存的危机,然后才是如何重建中国价值文化,拯救民族文化精神危机的问题。对儒家文化价值信念的动摇,使得知识分子把目光都转向了西方,希望能从西方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自己坚实的精神信仰,借以安身立命。

1.2 拯救与困境: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及其历史局限

近代知识分子寻求富国强兵以及民族文化价值秩序重建的探索实践,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性的氛围。诚然,在从龚自珍到孙中山这数代知识分子的奋斗中,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富有理性精神,更富有深邃明达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在现实中还曾有过建立新王朝(太平天国)的轰轰烈业,有过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壮举;还有结束(至少是形式上)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宏业,然而,从对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的实践来看,他们的奋斗最后却都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代替民族危亡的拯救和中国文化的重振

的，却是社会一步步地走向令人窒息的地狱般的深渊，是文化价值失范的日益严重。人民除了得到更多更惨的痛苦煎熬以外，一无所获。近代先知先觉者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悲剧式人物。这一切实际上都蕴含着某种文化发展的逻辑必然，蕴含着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致使他们的文化反思和选择存在严重的思想局限性。

我们知道，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是在一个共同宗旨、共同的出发点下进行的，即他们最根本和现实的目的都是解救民族的危亡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时是那样的严酷和穷蹙，这一现实目的的强烈意识严重地冲淡了他们对传统文化本身劣根性的深刻反省，冲淡了他们对文化思考的理性成份。因此，无论是他们的实际变革实践，还是他们的思想理论，基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他们的整个文化心态都带有一条与传统封建文化难以割断的脐带。拖在他们抨击封建专制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慷慨激昂的无畏勇气和对民族出路的大胆探索背后的，时常便是传统封建士大夫的庸人辩子。毛泽东曾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作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这些民族的精英中，洪秀全揭竿而起，尽管富有极大的革命性，但是他所建立的整个政权从形式到内容基本上都无异以往的封建王朝，缠绕在洪秀全头脑中的思想意识，除了农民的平均主义以外，仍然是三纲五常之类的腐朽内容。康有为、严复在近代都曾开思想启蒙先河的人物，但最后他们却异途同归，以重新投入儒家文化的怀抱为自己的精神归宿，为孔家教义、封建伦理纲常的振兴光大而极尽播唇舌之能事。曾长期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的孙中山，虽然与清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在中国提出了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然而就是他也极力推崇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更是津津称颂，热衷不辍。